

—— 2005 ——

—— · 宏观组论文集之3 · ——

预防通货紧缩和 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2005 ——

—— · 宏观组论文集之3 · ——

预防通货紧缩和 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编著



4D223.6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防通货紧缩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005 宏观组论文集之3)

ISBN 7-301-09792-1

I. 预… II. 北… III. 通货紧缩-研究-中国 IV. 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100 号

书 名: 预防通货紧缩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编著

策 划 编 辑: 陈 莉

责 任 编 辑: 徐 冰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9792-1/F·124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电 子 信 箱: em@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505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致 谢

此项研究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表示感谢!

本课题历时一年,参与课题研究的各个成员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是:易纲、王召、蔡辉明、宛圆渊、林明、段辰菊、李丽、莫倩、黄异、李岩、宋红海、蒋永庆、毛亮、孙宁、施华。本课题各个部分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

在课题的完成过程中,吴敬琏、宋国青、樊纲、王建、石小敏、卢迈等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由作者承担。

《预防通货紧缩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课题组

2004 年 11 月

前 言

易纲(2005年9月12日)

本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同学们和我对中国通货紧缩形成机制及其与经济动态之间关系的全面研究,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资助。这是宏观组自1998年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三本书,前两本分别为《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2000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秋季,通货紧缩的迹象又隐隐显现。通货紧缩是经济周期中某一阶段的货币现象。在本书中,我们将产生通货紧缩的机理放在经济周期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并首次提出了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再回到通货膨胀的三期模型框架。在充分考虑主流经济学分析的产生经济周期的各种原因之后,本报告强调,在中国,产权界定不清和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价格杠杆失效是产生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互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报告认为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证动态有效的增长,就必须在长期致力于推进产权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

一、高增长与高波动相伴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36876亿人民币;人均名义GDP从1978年的379元上升到2004年的10561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6倍多。然而,“中国奇迹”却是在若干次经济的大幅波动中取得的。尽管市场经济都会出现周期,但是中国经济波动却有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

第一,经济波动幅度大。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过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11.3%下降到1990年的3.8%的过程,也经历过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的经济过热,以及1998年开始的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压力。这些短期内的大幅度经济波动不仅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

绩效,还直接导致了经济泡沫和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第二,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与行政力量密切相关,并且通常要使用行政力量来调控。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春风,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然后有1992年经济高增长。在1993—1994的宏观调控中,中央出台了治理整顿16条。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3—2004的宏观调控中,国家使用了货币政策(银根)、土地政策(土根)等一系列有保有压的组合拳。

第三,经济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对环境的破坏大,增长的成本高昂。2003年,我国的GDP折算成美元约占世界GDP总和的4%左右,但我国却消耗了世界钢材总量的25%、煤炭总量的30%、水泥总量的50%以及用电总量的10%。此外,我国可用水资源(包括咸水资源)在过去的15年中被污染得越来越严重,全国耕地总面积从1996年以来也在以平均每年10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

因此,如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动态有效的、可持续的增长,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框架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周期有过系统的研究,比如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和近代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本研究报告试图从产权缺失的角度来逻辑一致地诠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关于使用产权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经济,易纲(1988)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这篇文章收入本报告的附录),此项研究就是该分析框架在宏观方面的应用。

在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我们所谓的“产权缺失的角度”是指在产权界定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使得许多重要的生产要素(比如贷款和土地)不能得到市场定价,价格杠杆因此不能在投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出于政治前途考虑,政府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来扭曲投资成本,不计投资效率扩张投资规模,刺激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银行产权不清晰也会放大这种投资扩张,结果经济在当期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投资低效,第一期的过度投资会导致第二期的过度供给,而需求由于投资低效得不到同步增长,于是经济很快就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并由此引发银行坏账和各种隐性赤字;如果无节制地持续下去,这些银行坏账和隐性赤字最终还需要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这意味着长期经济会再次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

在这个课题中,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提出这样一个三期模型来刻画产权

残缺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在此条件之下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相互转化的内在机理(在附录中,我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明的逻辑图示)。

第一期:从产权缺失到通货膨胀

产权的缺失是经济波动的起源。一方面,当重要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完善的时候,政府在扩张经济的激励之下,总希望并且可能使用某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改变资源的分配,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来刺激投资。这对市场上的投资主体来说,无疑是一种额外的好处。然而,在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里,由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通过金融的加速器效应促使投资成倍增长。

另外一方面,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银行是一种“准政府机构”,很难做到利润和风险的平衡。于是,在政府强调发展的时候,银行过于慷慨的信贷支持不仅使得扭曲投资变得可能,而且会加倍地将它放大,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在政府强调风险的时候,银行又过分惜贷,促使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大。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景气时期还是在经济调整时期,银行产权不清晰都过度地放大了经济波动。蔡辉明的实证研究(第四章)就模拟了这样的一种过程。在投资的驱动之下,当期的GDP迅速增长,信贷开始扩张,通货膨胀压力也开始显现。经济由此进入了扩张和繁荣时期。

信贷扩张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资产价格上涨,这使得投资者变得更加富有,但同时也加大了形成泡沫的危险。而泡沫的破灭极有可能把经济带入长期的低谷之中。孙宁(第五章)着重讨论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和后果。

第二期: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但是,情况在下一期将会发生变化。正如易纲和林明(第六章)以及黄异和毛亮(第七章)在他们的工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产权不完善和价格扭曲的前提下,投资水平要超过社会的最优水平,社会总体投资回报降低,即出现“宏观好、微观不好”的现象。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的萨伊定律失效,社会在下一期并不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来平衡过度投资产生的过度供给,结果价格水平开始下降、真实利率逐渐上升(这一点在名义利率粘性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资产价格随之下跌,这将显著地减少企业的利润水平、净资产和负债能力;同时由于投资低效,银行坏账开始大量出现,无论银行通过强行清偿债务还是通过收缩信贷来应对,都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能力,货币供应量也会随之下降,结果导致价格水平的再一次下跌和投资效益的再度恶化,经济产生自我下滑的趋势,由此进入通货紧缩。

蔡辉明(第八章)、蒋永庆(第九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了从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能够通过这个机制得到很好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产权因素再次通过金融加速器的机理发挥了作用,但不同的是在两个时期它导致了完全相

反的结果——在短期引起通货膨胀,而在中期则转变成为通货紧缩。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长期干预,市场缺乏应有的信用法制环境,这在经济萧条时期将进一步地恶化信贷链条,加剧通货紧缩螺旋的后果。李岩(第十章)对此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第三期:从通货紧缩到再次通胀

当经济进入通货紧缩之后,政府面临如下三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不干预,任凭经济在低位进行调整直到回归到原来的水平。但这种方式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行。另外一种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帮助经济摆脱通货紧缩陷阱的方法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施华(第十一章)的研究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可持续的。不适当的财政扩张反而有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波动的源头。第三种方式是中央银行协助企业清偿债务,发行货币来抵补银行系统的坏账,重建商业信用,恢复投资信心。然而,这种方式同样要求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换句话说,无论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通货紧缩,都将意味着未来可能再次出现通货膨胀。

这样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趋势在货币方面带来的压力早已显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到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已经达到2万亿元,这还不包括被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所“剥离”的1.3万亿不良资产(第十二章)。尽管在现行的体制之下这些不良资产不一定会引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这些不良贷款最终还是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第二,通货紧缩加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高额的社会保险欠款问题凸显(第十三章)。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流量缺口正在逐年扩大,年缺口金额已经从1998年的100多亿扩大到2000年的500多亿,再扩大到2004年的1500多亿。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量能够满足这个缺口。事实上,如果将国有企业所产生的坏账考虑在内,国有企业整体上为净负债。显然,社会保险欠款的窟窿最终仍然要靠发行货币来填补。

麦金农的通货紧缩逻辑

以上三期模型是在费雪(Fisher, 1933)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扩展而得到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的基本传导机制与金融加速器理论在逻辑上完全一致。这一点在《1998—2000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和本书的文章中都有详细的论证,不再赘述。在通货紧缩研究中,麦金农等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或者说逻辑),在本书中基本没有涉及,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有广度和深度的本币债券市场,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借款。由于政府的负债通常是美元债务,政府往往千方百计地保持本币

对美元即期汇率的稳定。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原罪”。在存在原罪问题的债务国,一般国内利率的风险溢价比相同期限的美元资产高得多。国内企业和银行可能愿意借用美元贷款,却不考虑规避汇率风险。但是一旦发生货币攻击,国内借款人将不得不立即偿还国外短期美元债务,可能引发货币贬值。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韩国、印尼都可以印证原罪模型的逻辑。

进入新千年以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成为美元债权国。对任何无法以本币提供信贷的国际债权国出现的货币错配问题,可以称之为“高储蓄两难”。这些国家通常是国际收支顺差,向外国提供融资,但其日益增加的国外权益并非以本币计值,大部分私人或官方外汇储备持有的对外权益都是流动性很强的美元资产。随着其美元权益的积累,国内美元资产持有者越来越担心美元资产会不断转成本币资产,迫使本币升值。同时,外国人开始抱怨该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货币低估引起的,国外要求本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允许本币升值,就可能会引发通货紧缩,经济最终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但如果债权国不让本币升值,国外就会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过去十几年的日本可以印证高储蓄两难模型的逻辑。

简而言之,“高储蓄两难”的逻辑:一国的储蓄率高引起国际收支顺差,私人 and 官方外汇储备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如升值可能通货紧缩;如不升值或升值幅度比市场预期小,则必须降低本币利率,也可能陷入零利率和通货紧缩陷阱。

三、严格保护产权,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

推进产权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产权缺失所导致的政府扭曲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一期经济因为投资成本的扭曲而产生通货膨胀;在二期,因为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而走入通货紧缩;在三期,冲销坏账和政府赤字将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在这样的波动中,重复的投资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坏账率的升高增加了国家的金融风险,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也因此受到损害。所以,推进产权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是减少经济波动、增加动态效率、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途径。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完成了对宪法的修订,这无疑为将来进一步推进产权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产权,我在许多文章中(如易纲,1988)有过论述,这里着重讨论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较多情况下,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党的十六大(2002年)明确提出了要完善政

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就是说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主要负责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产权制度的完善加上政府职能转变,能够给私人部门创造稳定的预期,这又无疑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公众有恒产有恒心。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

邓小平是一位历史巨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那时讲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的,其含义十分明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要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从经济数字上看95%生产资料和经济总量掌握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手中。国家掌握各行各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几乎所有环节,配置资源的权利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在那时,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含义十分明确,不要再以革命运动为工作重点了,取而代之的,要以经济建设(业务工作)为中心。农村搞好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工厂制造出好产品、商店搞好流通、学校搞好教学、军队抓好训练。全党工作重点回到各行各业的本职主营业务上去。由于国家直接掌握着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和环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党政干部的工作重点是直接抓好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无所谓宏观调控,政府直接负责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

党的十四大(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在所有制上,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有及国有控股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分配制度上,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价格制度上,95%以上的资源是以市场价格来配置的。在就业上,非公经济就业量已远远超过公有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

党的十六大(2002年)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总结,是完全正确的。虽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面对的经济环境与1978年大不一样了。

第一是经济主体不一样了。1978年时,政府和经济主体是一体的,几乎所有的经济主体(生产单位)的产权都在政府手中,其领导人是政府任命的干部。政府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政府一声令下,所有的工厂、农村、

商店等经济主体就可以开足马力。目前我国经济主体的产权是多元的,生产单位在法律上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平等企业(原则上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企业依法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第二是分配关系不一样了。1978年时,分配上基本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多少、如何分配政府说了算。目前,分配制度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可以确定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的基本分配格局,用税收调节分配,用社会保障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等。

第三是就业的责任不一样了。1978年时几乎所有人都隶属于政府的一个单位(在农村是生产队),政府包下全社会的就业(上山下乡、插队也是安排就业的一种方式)。目前是自谋职业、自主择业,自己照顾自己,非公经济的就业机会已远远超过了政府及其事业单位和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

此外,在法律关系上、价格体制上、社会保障制度上等许多重要方面,目前与1978年时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政府仍是组织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活动的最主要角色,是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是政府在招商引资。所不同的是多元化产权的经济主体开始形成,其结果是企业追逐利润,个人为收入最大化而努力工作。这种激励制度的引入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创新能力在什么地方?谁在为经济发展不停地操心?若全面回答上述问题非常复杂,但可以简单回答(有些片面、有些抽象)如下:在计划经济下主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下主要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政府有执法、规划和监管职能;而在转轨经济中是政府加家庭和企业。

政府的角色在过去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二十多年了,多元所有制市场主体的格局基本形成。但总体看来,我国经济仍在转轨中,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仍然很强,政府有形之手还没有退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限。主要表现在:

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冲动。虽然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但各级地方政府追求增长速度和政绩工程的现象普遍存在。各级地方干部的行为是理性的,追求速度的干部得到了重用和提拔,上马投产的工业项目为地方增加了税收。于是各级政府都在大干快上。首先,是党委和政府一齐上。目前的体制是在正职以外各级设若干副书记、副行政首长。因此到各级政府大都能见到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副行政首长,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和副行政首长等。第二,招商引资是龙头。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分工负责、是岗位责任制,谁介绍来的,搞成搞不成,谁的项目分得清清楚楚,形成领导们在招商引资上的竞赛。领导竞赛的结果是领导的指标下派,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学校老师也忙于招商

引资,因为分管领导的任务没有完成,就动员自己分管的部门一齐上(发动群众)。我们经常见到各地你来我往的招商引资团,省一级的、市一级的、县一级的,还有乡镇一级的;党政领导带队,下级党政领导参加,再加上企业老总。招商引资团穿梭忙碌在祖国各地,在港澳,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也见过外国首脑访问带来企业家的阵势,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一齐上的阵势确实有特色。客观地说,我们这种抓经济的方法总体上是有效的、正面的,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政府的公权对经济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工商注册权、税收权、卫生检查、环保执法、社会治安加上公、检、法等。相对政府这些公权而言,企业和家庭的私有产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相当脆弱的。是非、对错的裁决权在短期是在政府手里;当然长期有历史的裁决。

那么,在新形势下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什么呢?回答很简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执法主要指保护各类产权和各类合同的执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收税。监管主要指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管理包括各类财产、人口的登记工作,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应该是登记、注册。各类财产特别是不动产的登记要准确、完整,这不仅是保护产权和税收的基础工作,还有利于减少社会纠纷。还有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的救助等。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社区医疗服务、社会治安、信息服务等。

前些日子,成都在和杭州争论哪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成都认为是成都,举出一大堆理由,杭州认为是杭州,也列出了一个优点的清单。将来如果政府之间比哪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和省份,政绩观就对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要自然环境好、执法守法环境好、基础设施好、社会治安好、教育质量好、公共秩序好、文化氛围好、社会保障公平等。这些集中起来都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执法监管,做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样就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公平竞争环境,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各地政府的观念也都在转变,有些政府已经这样做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国在过去26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已经证明我们的优势。中国的做法是有效的,但同时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资源、安全问题,还有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如果有更多的干部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更可持续,环境保护会更有效,法制社会会更健全。

完善宏观调控

我们强调产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在平滑中国经济波动上的重要性,并

不代表我们忽视宏观调控的作用。只有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减少经济波动,维持好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局面,才能为推进产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创造条件。但是,这样的调控应该主要是市场化的调控而非行政性的调控,主要是总量政策而不是结构调控,主要是短期政策而不是长期政策。宏观调控的实施者是政府,其目的主要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好的宏观调控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但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应依靠市场力量进行,体制等长期问题主要靠改革解决。

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宏观调控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宏观调控是对市场经济而言的,特别是针对市场的局限性和缺陷。计划经济用不着宏观调控,因为,资源配置均在国家掌控之中;在生产领域,国家按照计划组织生产,社会资源基本上是政府配置;在消费领域,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了工资和工分制度,给消费者保留了一定的选择权。在计划经济中,除了个人消费之外,资源不经过市场配置,当然也就无所谓宏观调控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二大(1982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三大(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市场配置资源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相应地,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也在不断地下降。同时,也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合理性不断确认的过程。从范围上看,这种确认从农村过渡到城市,从消费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从生活资料方面转移到生产资料方面,从流通环节扩展到生产环节;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确认实际上经历了从对交易的保护到对产权的保护的过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显然,极限就是国家要保留适当的宏观调控权力。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在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这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政府的首要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上来的必要性。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困扰仍然是行政部门顽强地通过各种途径要求配置资源的权利,并且通过各种机会不断地表现出来。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成就不断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下去。

成熟的市场经济更多使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宏观调控”。这并非简单的字面差别,两者内涵也有所不同。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政策都主要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还包括国家的规划、计划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经济学家对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经济学家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并不主张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学派,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殊途同归地得出政府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的结论。只有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但也承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应慎而用之。经济学分析的主流共识认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是政府,其目的主要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理想的宏观调控应主要是总量政策和短期政策,应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宏观调控的总量性。宏观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熨平经济周期,所考虑的变量都是产出、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总量指标。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政策,通过调整利率、汇率、货币供给等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从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财政政策是具有结构影响的总量政策,通过加税、减税、赤字或盈余预算来影响总量,主要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来调整结构。总量调控的目的是尽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结构调整十分重要,为什么在这里不愿意提宏观调控的结构调整功能?经济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比如,内需与外需,我们将坚持扩大内需;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我们将尽量提高消费率;在消费中,我们将着力扩大服务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在以上比例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如果是产业和行业的结构调整,我们就要十分小心了;如果是对企业或者项目的结构调整,就要更加小心。政府必须制定企业准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等,并严格执法。对违法企业和项目,要坚决依法处置。但这是执法,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结构政策的代表是产业政策,其实政府很难制定哪些行业、企业、项目是应该支持的。世界上多数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弊大于利,即便是在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韩国,也仅仅得到了毁誉各半的评价。当然,通过基础科研、国防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民族企业是有效的,但这也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所以,结论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主要应通过市场力量进行。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合理性的主要原因是短期内存在价格粘性;而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结论都成立,市场自动调节得到最优化的结果确信无疑,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自动消失了。最雄辩地论证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必要性的凯恩斯深知他推荐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这也正是凯恩斯名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的真正含义。

以上三点是宏观调控的基本属性。此外还强调两点。一是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在我国过去几次宏观调控中,尽管行政权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997年到2000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减少

了投资的积极性,成为形成通货紧缩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03年到2004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真实利率,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是随着真实利率的起伏而波动的,利率至关重要。汇率也是如此,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我国的出口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杠杆能够起作用,通过经济杠杆来对经济进行总量调控是可行的。综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际经验来看,使用价格杠杆调控经济(熨平短期波动)不仅有效,而且副作用较小。

四、结 论

中国经济高成长性与高波动性相伴随的特点来自于产权界定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政府干预。本书提出了一个三期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个现象。模型化这个分析框架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作为本课题的后续研究。

要改变这种高波动、高浪费的增长模式,需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明晰产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改善宏观调控则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的动机会逐渐减少,从而减小经济因行政驱动而出现大幅波动的概率;另一方面,随着产权的不断完善,价格杠杆会越发有效,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杠杆。

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规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尽管“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概念不完全相同,但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宏观调控应该注重总量问题和短期问题。体制问题要靠改革解决,而结构调整则应该主要由市场自主完成。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优化,而不是试图用行政手段直接解决结构问题。总之,所有的分歧和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一句话: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信到什么程度?

目 录

第一部分 走出通货紧缩:理论综述

第一章 通货紧缩的成因	3
一、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4
二、需求下降理论	6
三、货币主义观点	7
四、生产能力过剩	8
五、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观点	9
第二章 通货紧缩的应对	11
一、负名义利率	11
二、降低长期名义利率	13
三、设立通货膨胀目标或者价格水平目标	14
四、财政扩张	15
五、货币贬值	15
六、未雨绸缪	17

第二部分 前通货紧缩:产权与通货膨胀

第三章 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	21
一、引言	21
二、投资过热的判断	22
三、过度投资分析的产权逻辑	25
四、过度投资的危害和后果	28
五、总结性评论	30
第四章 金融加速器与中国经济波动	32
一、引言	32
二、中国经济的波动及统计性质	33
三、理论回顾	36
四、基准模型	39
五、校准	44
六、模型的周期性特征	48
七、总结性评论	51



八、附录	52
第五章 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变动	56
一、引言	56
二、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做出关注:理论综述	57
三、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关注	58
四、中国的货币政策能做出什么反应?	68
五、总结	72
六、附录:价格传导机制及中国物价变动	72

第三部分 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第六章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79
一、引言	79
二、国有企业的事后的费用最大化从而事前的投资最大化是 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增长)的主要动力	81
三、1992—1997 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83
四、亚洲金融危机是 1992—1997 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点	86
五、总结性评论	94
第七章 产权、微观绩效与宏观波动	98
一、微观低效与 1998—2002 年的通货紧缩	98
二、微观低效使宏观经济仍面临较大的波动风险	104
三、以产权为主线推动微观改革,降低宏观波动风险	108
第八章 开放条件下中国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	111
一、引言	111
二、用“两个特征、一个伴随”来把握通货紧缩	112
三、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和开放条件	113
四、过度负债和间接融资	115
五、理解中国通货紧缩的全过程	118
六、中国版本的债务—通货紧缩	128
七、经验教训	130
第九章 中国的利率政策和通货紧缩	132
一、引言	132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衍变以及利率管制	132
三、通货紧缩与真实利率	138
四、利率市场化方向	149
五、结语	151
第十章 法律制度、信用环境与通货紧缩	153
一、引言	153
二、法制、信用环境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154
三、法制、信用环境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	157
四、法制、信用环境与个人	160